



凤凰文库  
当代思想前沿系列

*Thought* | 邪 恶

[英] 玛丽·米奇利 著

陆月宏 译

Wickedness

Mary Midgley

中华女子学院



0429035

江苏人民出版社

ROUTLEDGE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院图书馆

D09  
177



凤凰文库  
当代思想前沿系列

*Thought* | 邪 恶

[英] 玛丽·米奇利 著

陆月宏 译



Wickedness

Mary Midgley

中华女子学院



0429035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邪恶 / (英)米奇利(Midgley, M.)著;陆月宏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6

(凤凰文库.当代思想前沿系列)

ISBN 978-7-214-07670-0

I. ①邪… II. ①米…②陆… III. ①政治哲学—研究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6142号

## Wickedness

First Published in 1984 by Routledge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Inc., part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LLC.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2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06-094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封面贴有 Taylor & Francis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出售。

## 书 名 邪 恶

---

著 者 [英]玛丽·米奇利

译 者 陆月宏

责任编辑 刘 焱

装帧设计 陈 黎

责任校对 蒋卫国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者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毫米 1/32

印 张 8.125 插页4

字 数 204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7670-0

定 价 24.00元

---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 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 译者的话

米奇利出生于英国伦敦，父亲名叫汤姆·斯克鲁顿(Tom Scrutton)，母亲是莱斯莉·斯克鲁顿(Lesley Scrutton)。汤姆·斯克鲁顿曾经是达尔维奇(Dulwich)的助理牧师，后来成为国王大学附属教堂的牧师，接着在剑桥、格林福特(Greenford)和伊灵(Ealing)得到提升。米奇利受教于伯克郡科尔德阿什(Cold Ash)的唐尼寄宿学校(Downe House School)。她在这里对古典文学和哲学产生了兴趣。米奇利在1937年秋天参加了牛津大学入学考试，进入萨默维尔学院(Somerville College)。在这里，她除了学习希腊和罗马历史，还研究了哲学。她认为：“首先把哲学与希腊联系在一起，根本上来说并非愚蠢，这是因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学派哲学家确实是一流的哲学家，他们对后来的思想拥有深刻的影响。不过毫无疑问，存在着大量其他好的方法。哲学(我相信)如今可以与诸如心理学和物理学这样的其他学科结合在一起……联合课程是最好的。”她在牛津认识的一些朋友是科学家，她认为自己在许多学科中从他们那里获益匪浅。她参加过牛津的工党俱乐部，后来与克罗斯兰(Tony Crosland)和詹金斯(Roy Jenkins)一道参加民主社会主义俱乐部委员会。她后来认为，由于“二战”所导致的男性大学生的离开，她

的哲学生涯受到了当时参与讨论的女性的影响。“我认为,这种经验与这个事实有关,亦即伊丽莎白[安斯科姆]、我、艾丽斯[默多克]、富特(Philippa Foot)和沃诺克(Mary Warnock)都在哲学中闯出了名声……我真的认为,在平常的时期,许多优秀的女性思想遭到了荒废,因为它根本没有获得倾听。”

离开牛津之后,她成为了唐尼学校和班德福特学校(Bedford School)的教师。1947年,她回到牛津为默里(Gilbert Murray)工作,稍后效劳于学院的工作和研究。她在1949年去了雷丁大学(Reading University),任教于哲学系。1950年,她与杰弗里·米奇利(Geoffrey Midgley)结为伉俪,移居纽卡斯尔,在纽卡斯尔大学任教多年。他们有三个儿子。她现在仍然住在纽卡斯尔。

她在纽卡斯尔大学开始研究动物行为学(ethology),所产生的研究成果就是她的处女作《兽与人》(*Beast and Man*)。这部著作在她59岁时出版。此后,她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和论文。人们认为她是极好争辩的,是英国最令人生畏的哲学家。米奇利在1995年获得了达勒姆大学(Durham University)利特(Litt)荣誉博士学位。2005年,她出版了自传《密涅瓦的猫头鹰》(*The Owl Of Minerva*)。

米奇利把哲学看做探测(plumbing),认为哲学是直到出错人们才会注意到的东西。尽管家庭具有宗教背景,她自己却不信教。当然,她也没有简单粗暴地忽视宗教。她的处女作《兽与人》是对人性的考察,同时也是对社会生物学的还原主义与流行于诸多社会科学中的相对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反应。米奇利反对还原主义。她认为关于实在(reality)存在着许多地图和窗户,声称“我们需要科学多元主义——承认存在许多相互依赖的知识形式和来源——而不是还原主义,这种还原主义相信在所有知识形式和来源下面存在一种基本形式,这种基本形式决定了一切事物”。她提请我们最好把这个世界看做“一个巨大的水族馆。我们无法自上而下把它视为一个整体,不过我们可以通过许多小窗户注视它……

如果我们耐心地把从不同角度得到的资料结合在一起的话,那么我们最终就能获得大量有关水族栖息地的感觉。但是,如果我们坚持我们自己的窗户是唯一值得从中进行观察的窗户,那么我们会深入不了多远”。她声称:“认识到事物以某种方式类似于精神并能够为精神所穿透,并不是在增加一种新的……假设……它是对我们已然在做的事情的一种逐渐意识。”她认为这就是那个使爱因斯坦真正惊讶不已的主题,也就是思想的法则最终被证明就是事物的法则。米奇利的一个令人惊奇的观点是:人类要比许多社会科学家所承认的更加接近于动物,而动物在许多方面甚至比人类更加复杂精致。她在与道金斯(Dawkins)的论战中,批判了认为可以按照基因结构理解人类的观点。她认为应该运用动物行为学和比较心理学的方法来理解人类。

为了驳斥出现在科学著作的某些引人注目的先知式和形而上学式段落中的伪科学思考,米奇利撰写了《作为宗教的进化》(*Evolution as a Religion*, 出版于1985年)与《作为拯救的科学》(*Science as Salvation*, 1992年)。前者对付的是进化论生物学家的理论;后者对付的是物理学家和人工智能研究者。她相信这些理论无法解决世界正在面临的社会和道德问题。在自传《密涅瓦的猫头鹰》中,她谈到了家庭的历史、个人的成长、对自己的家庭及其内部道德困境的观察,反映了她对人性问题的分析和省思。

## 二

在本书中,米奇利认为,罪恶问题既涉及上帝,也涉及独特的人类心理学问题。我们有必要理解使人类的邪恶变得可能的自然倾向,但是当代不同的心智习惯使这种理解变得困难重重。(1)有一种观念要求仅仅根据外部的社会原因来解释一般的人类行为,尤其是解释错误行为。米奇利认为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因为就方法上来说,我们在解释上既需要



社会原因,也需要个人原因;就道德上来说,我们需要避免宿命论。从这种观念出发,关于错误行为的自然来源的观念就会遭到遮蔽,因为人们事先假定了任何这样的来源都必须是一种相当特殊的肯定性倾向,例如敌对行为。或许另一种做法是把罪恶视为否定性的,视为对肯定性能力的拒绝和否定。(2)然而在今天,人们怀疑整个邪恶问题是虚构出来的,也就是说,人们怀疑罪恶或邪恶的存在。不过这种怀疑通常仅仅意味着,区别之处在于:不赞成压抑,而不是通奸。

视罪恶为否定的观念,暗示了一种独特的、原初的人性。这种人性具有相对特殊的能力和无能。“除非把罪恶视为纯粹外在的敌人,是完全外在于人性之物,否则把它的某些源头摆放在这种原初设置的不均衡之中,看来就是必要的。”

把罪恶视为完全与善相分离的肯定力量的观念是诱人的,不过这种二元论的摩尼教方式容易导致疯狂的悖论和对生命的憎恨。同时,传统观点具有自身的悖论,这在苏格拉底的有关“没有人会故意犯错误”的理性主义宣言中强烈地表现了出来。这句宣言暗示了我们都栖居在同一个道德宇宙中,我们原则上都能够理解彼此的道德判断。这种显得极其自信的主张激起了同样自信和极端的浪漫主义的个人主义主张,这种主张认为每个人或社会都具有独特的、无法交流的问题,思想在这里无能为力,只能用情感或决定来回答它们。米奇利认为这两种极端主张都是不切实际的。为了有效地行动,我们必须思考,必须理解彼此的主导性观念,因此道德问题也是一个有关方法的问题。我们应该这样理解人类动机领域,亦即它在原则上统一得足以使交流和解决道德问题成为可能。为了能够交流,我们就有必要假设这种动机中的一致性。理性主义者由于过于独断,由于忽略了许多重要而令人担忧的动机,从而模糊了这个真理。尼采把自己的活动视做对道德的颠覆,亦即“非道德论”。对以尼采为代表的这些人来说,存在两种完全相反的颠覆类型,亦即还原类型的颠覆,与怀疑论类型的颠覆。前者用一种同样有局限性的动机理

论取代了传统的动机理论,后者否认任何这样的理论是可能的。教条式的怀疑论类型的颠覆,以认为原罪是被打破了的神话的观念作为基础。但这种颠覆只适用于存在特殊教条化错误的地方。

但是为了理解真实的情形,我们就有必要限制怀疑论和还原论这两派的主张。怀疑论理应是真正的考察,而不是教条式的否定。恰当的做法是指出传统道德中的特殊谬误,而不是不假思索地谴责它们。就想要把动机视做原则上可理解的有秩序整体而言,还原论是有益的;就它出于争辩的需要而有意夸大和简化这种秩序的方面来说,它是误导性的。

今天,思考这类问题是艰难的,例如:苏格拉底是正确的吗?作恶者知不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这是因为我们害怕进行道德判断,一概认为这样的判断是独断的和自以为是的。由于另一种困难,这种害怕加深了,亦即认为关于个人的系统思想判断绝对是不可能的,而只有关于集体的系统思想的判断才是可能的。米奇利指出,事实上为了研究人类生活,个人思想和集体思想这两种途径都是必不可少的。在反对这种集体思想的反应中,存在主义及其他的现代思想路线发展了一种极端和不切实际的个人自主观念。米奇利认为这两种观念都是极端的和不真实的,我们应该从这两种极端观点中撤回来,而把个人自主性与个人和世界的连续性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由于现代世界中官僚机构的日益错综复杂,对道德判断的回避变得更加轻而易举。我们需要抵制这种回避。在我们思考个人的不道德行为,尤其是思考其动机的情形中,最糟糕的障碍可能是以下观念:认为不道德行为的动机是天生的敌对行为,而这种敌对行为被设想为肯定性的、孤独的和不可抗拒的内驱力。米奇利认为这个观念是绝对错误的。罪恶与敌对行为不可能是等同的。把它们等同起来的做法既妨碍了对范围广泛的自然动机的考察,又平庸化了邪恶观念。它导致了把邪恶者视做相异团体的不真实的观念。

敌对行为不都是邪恶的,同样,不是所有的邪恶都是敌对性的。大

多数邪恶具有不同的动机。作为动机的敌对行为，只有脱离控制时才是危险的。事实上，脱离控制的其他动机也是危险的。作为动机的敌对行为主要来自于愤怒，以感受愤怒的能力作为前提条件。在许多动物中都可以发现这种倾向，它不是一种纯粹普遍的杀戮或毁灭倾向。与此相反，它适当地起着作用，作为区隔个体的机制，以使它们的生活变得可能的方式而进行服务。人类共享着这种感受愤怒的能力，以及大量引导着运用愤怒的限定性结构。恐惧也与罪恶有关系，它也能产生罪恶。恐惧同样牵涉到一种中性机制。它是我们存在的一部分。恐惧是好的还是坏的，得视具体情境而定。恐惧和愤怒都是必不可少的动机，因为与痛苦一样，两者都是对罪恶的恰当反应。我们要做的是正确地引导它们。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是一个能够把罪恶阻挡在外的乌托邦，而是带有罪恶的世界，我们因此需要恐惧和愤怒。

另外，即使在罪恶不存在的地方，我们人类也需要兴奋，而兴奋当然包含某些恐惧。人类当然也需要性冲动。而这两者都具有身体基础。一般来说，没有人认为这是危险的。人们假设敌对行为比恐惧更加危险，不过这很可能是错误的。敌对行为也不是如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那样本质上是破坏性的。例如，争论包含敌对性因素，但是争论者不会要求毁灭对手。具有一定程度的敌对行为因素的儿童游戏，显然不是破坏性的。事实上，米奇利认为，不存在任何非敌对性的人类社会。反对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本质性因素，而敌对行为是使它起作用的情感装备的一个组成部分。

米奇利谈到了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的关系。她认为决定论是为了研究科学的目的而建构出来的有关秩序的假设。为了进行归纳概括和做出预测，我们需要决定论。不过反过来说，我们大多数的规则性思想却不是归纳性的或预测性的。例如，实践性的思想不是预测我们行为的努力，而是设计行为的努力。但是，由于有关上帝的预知与自由意志之间关系的争论，要理解这一点就变得困难重重了。这些争论鼓励了把自然

力量人格化为神性的倾向。包括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内的历史理论，容易沉溺于这种迷信式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因此，社会科学家努力通过把决定论局限于自然世界，通过谴责所谓的“生物学决定论”，而来捍卫我们的自由。但是，米奇利指出，用这种方式很难隔开决定论，而所导致的结果却不仅是精神和身体的一种奇特分离，而且对社会科学的归纳概括和预测来说是一种相当大的威胁。事实上，可预测性自身对人类的自由意志并不是危险的。可靠性和相称的行动与人类尊严是可以相容的，而且人类尊严需要它们。使预测显得讨厌的是某种误入歧途的错误的机械论。人性观念不是宿命论式的，而是我们理解动机的必要背景。米奇利认为，决定论不是宿命论，它不会对自由意志产生威胁。实践性思想通常是创造性的，并且难以预测。如果决定论是适度的和实用性的话，那么创造性就不会与决定论无法并存。

认为邪恶在我们身上没有真正的根源，而是文化所引入的外在现象的观念，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观念。它把恶理解为外在的因而是绝对的力量。事实上，这个观念起源于一个真正的问题，亦即邪恶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的一部分，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则不是。人类在这方面的两难困境是：承认恶的动机会导致对待它们的宿命论态度；而拒绝承认它们，却可能会遮蔽它们的存在，使我们对它们视而不见。后者导致的结果就是：把恶投射于外部世界，把它们归因于其他人。这种现象就是自欺。关于自欺的绝对完整的例子寥若晨星，但是在其中进行着狂热冲突的局限性例子却是司空见惯的。我们可以在戏剧中找到大量这样的局限性例子，亦即我们人格的内在冲突。这种内在冲突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我们的人格。我们可以把人们努力拒绝和遮蔽的人格中的某些方面称为“阴影”。人格的内在冲突主要就是在表面的正式自我与阴影之间进行的。这种冲突虽然没有获得太多的哲学关注，不过却常常获得富有想象力的作家的敏锐理解。《化身博士》这篇小说就深刻地揭示出了邪恶的负面方面。杰基尔在从拒绝阴影到承认阴影的过程中，丧失了核心，而

成为了任何人，成为了空心人。在《一个无罪罪人的忏悔》这篇小说中，野心勃勃的虚荣自负席卷了赖希姆，最终把他遗弃在人格中毫无真正动机的境地之中，除了模糊的和非人性的惊骇之外，一无所有。正是由于否认人格中的阴影和无意识地向外投射阴影，他完全崩溃了。

自我与阴影的冲突，对阴影的掩盖和与此相关的自欺，无意识地将阴影投射于外部，这些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在迫害女巫、异端迫害和反犹太主义等等中表现出来的对外部群体表达的敌意。受到公共投射的阴影正是这种敌意的原因。米奇利相信，在这些充满敌意的运动中，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显然进行了有意无意的共谋。正是被投射出去的阴影——动机，为这些运动提供了动力。被领导者，或者说运动的支持者没有能够认识和处理最初属于他们自己的强烈动机，因为他们有意无意地把它们投射出去了。根本上来说，正是由于自己的责任，他们成为了邪恶的被动工具。

有关恶的庄严高贵的观念在浪漫主义复兴之后成了显赫的观念，它的戏剧性力量不容置疑。米奇利认为，一旦我们放弃浪漫主义的偏爱所导致的华而不实的观念，那么弥尔顿描写魔鬼的东西根本就不是讨人喜欢的。事实上，撒旦的动机主要是卑鄙的，幽闭症式地全神贯注于自我肯定之上。他的庄严高贵来源于并非他自己创造的最初的本性，而他魔鬼般的力量仅仅产生于追求这种狭隘的自我肯定的努力。正如其他的煽动者一样，撒旦的核心动机是负面的，是毁灭性的，在没有促进任何更富有建设性的其他目标的意义，根本就没有正面的内容。这种令人震惊的情形也以极端形式出现在《奥赛罗》的埃古身上。埃古的动机是奇特的“无动机的恶毒”。在这种动机中汇聚了嫉妒和骄傲。但是这些动机并不足以解释埃古的行为。他事实上是一个隐蔽的偏执狂。这样彻底的片面性在实际生活中是罕见的，不过我们可以在文学所表现的非典型的孤立情境中展示它，以便有助于我们理解生活。这些极端的病例告诉我们，为了解动机，我们必定需要一套有关秩序井然的需要的观念。

性或存在主义的解释都无法充分说明他的行为。埃古的驱动性动机是纯粹毁灭性的。

接着,米奇利考察了把毁灭性视为动机的观念。令人迷惑的是,毁灭性为什么通常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超出了其他目标可能偶然产生或要求的東西?在希特勒和埃古身上体现出来的自我毁灭情形,使这个问题变得紧迫万分。强迫观念自身看来也与毁灭性有关系。这里的情形显然涉及许多动机。米奇利认为,弗洛伊德关于宇宙性死亡冲动的观念引人深思,不过并非连贯一致。弗洛伊德之所以把外在的攻击性看做由失败愿望导致的死亡冲动的副产物,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把自我设想为本质上孤独的个体。因此,自我最深刻的愿望始终是自己指向的。由此出发,文化被他视做异化的体系,是由于人们的生存需要而从外部施加于他们之上的。米奇利指出,在弗洛伊德的早期著作中,把个人孤立为脱离正常社会背景的“病人”的医学模式,进一步深化了这种孤立。这样一来,个人的所有愿望指向的就是自己的快乐和生存。

第一次世界大战显然震撼了弗洛伊德,使他确信存在着独立的毁灭性动机,从而引进了一种甚至更加广泛和简单的基本动机,亦即死亡冲动,而快乐和生存自身反过来只不过是通向死亡冲动的“迂回道路”。弗洛伊德声称,这种死亡冲动在宇宙中与爱洛斯或爱进行着持续不断的竞争。米奇利认为,这种对邪恶问题的回答是摩尼教式的,因为它援引了两种不可调和的力量。

弗洛伊德要求诚实地对待死亡冲动。死亡冲动通常指向外部,是完全致命性的。重要的问题在于,人们如何控制这种独立的宇宙力量。弗洛伊德的做法是坚决地站在爱洛斯这边,与死亡冲动进行斗争。

弗洛伊德承认这种毁灭性的人类动机的力量和独立性,承认它们将导致更多战争的可能性,承认需要对它们进行某些控制。但是,米奇利指出,由于对死亡冲动的形而上学的泛化,使它们显得奇异怪诞从而不可能进行控制。如果死亡冲动存在的话,那么它们的面貌不可能是完全

像这个样子的。她认为,弗洛伊德的死亡冲动观念具有正面和反面。正面在于,它努力地把普通的狭隘的动机观念修正为通向自我利益的直接道路。死亡冲动允许进一步认识形形色色的自然动机及其必然会冲突的倾向。它的反面在于,有关直接的死亡冲动的观念过于粗糙以至于不可信。对于自身和他人来说,破坏性确实能够成为一个目标,甚至能够成为主导性目标,但是,只有通过颠倒、再组合和限定自然愿望,才能如此。而这里的原材料主要是我们自然的对他人的敌意。事实上,自我毁灭是放任的怨恨情绪的一种结果,而且是一种次要的而非必然的结果。米奇利赞成柏拉图的观点,亦即相较于忍受不义行为,做出严重的不义行为是更糟糕的。人类的堕落表现在选择了做出严重的不义行为这条道路。

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死亡冲动不是可信的。直接的死亡冲动是不可能的。许多人过于简单地理解进化,以为它只是自我主义者的庸碌行为,其目的仅仅在于允许自我保存特性的发展。米奇利指出这是错误的,因为遗传特性的传递不是通过个人生存进行的,而是通过亲属的生存进行的。进化不是一种适合于自我保存的策略,而是使我们的自然愿望的冲突变得不可避免的过程。当日益发展的智能产生了意识冲突时,人类就不得不被迫忍受分裂的痛苦,以形成某些协调相反冲动的策略。道德正是这样的协调策略。因此,当道德问题令我们迷惑时,我们就需要理解道德所涉及的原初动机与这些原初动机所倾向的颠倒类型。我们应该以同样的方式来理解坏行为。对特定情形来说,这就意味着辨认出特定的动机。对作为整体的人类来说,它意味着寻找一般的倾向,寻找使理解它们变得可能的历史和进化的考虑。在这两种情形中,我们都必须寻找个人或进化的成效。如果我们无法找到这样的积极成效,那么我们会完全无法理解邪恶,就会陷于类似于弗洛伊德和摩尼教的二元论观念之中,就会认为坏行为是难以置信的。在人格开始分裂的地方,动机将仅仅需要是强迫性的或上瘾的。在这里,我们认为坏动机的坏恰

恰集中在它所欠缺的东西之上,比如说,自私主要不是表现为极端自爱,而是表现为对他人的漠不关心。

米奇利接着探讨了二元论思想的价值。她认为当我们从作为人格的原材料的自然动机转向精致的策略和产生它们的意志时,这种价值就变得清楚了。为了进行选择,我们需要一张带有垂直维度的地图,这种维度面向的是生命与死亡、光明与黑暗、落后与进步。当然,把实际上对生命的混淆与垂直维度联系起来,是困难重重的。我们在这里需要对动机心理学的良好理解,而这种理解必须不断地适应世界上的实际变化。

陆月宏



## 劳特利奇名著版序言

存在着像邪恶这样的事物吗？

邪恶意味着有意识地做出错误行为。但是，这真的会发生吗？

在刚过去的这个世纪里，在世界上我们所处的这个部分中，人们把邪恶描述得看来相当像神话。对于这样一种现象是否根本上真的会发生，人们提出了许多质疑。一方面，我们关于不同文化日益增长的知识使得这一点似乎模糊不清了，亦即任何一种行为是否是真正的和在客观上是错误的。另一方面，不同的描述其他因果关系形式的科学体系，削弱了自由意志观念。它们使人们难以明了我们的意图如何可能真的是我们行为的源泉。

可是，在这同样的一个世纪中，我们称之为“邪恶”的现象当然没有随风而逝。它也丝毫没有变得更加容易理解；事实上，它变本加厉地压迫着我们。例如，如果我们回想起纳粹大屠杀以及其他大屠杀的话——以便最好不要忘却其他大屠杀，例如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屠杀——关于邪恶含义的问题就会沉重地压在我们心头。当我们听到连环杀手，例如最近的哈洛